

阳明学与地方志关系刍议*

张宏敏

提 要：阳明学与地方志之间具有多重关联。王阳明认为，“为天下万世而作”的志书不仅具有“考图志以求其山川形势”的地理认知功能，还有“可以观政”的资政属性。受王阳明影响，阳明后学践行以志观政、经世致用的方志观，或在仕宦地，或在家乡，参与明代中后期诸多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的具体修纂。而流传至今的众多地方志文献，为我们全方位、深层次了解以“阳明行迹地”为指向的王阳明与各地域文化之间的诸多交涉，尤其为“地域阳明学”的系统梳理与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

关键词：王阳明 阳明行迹地 地方志 阳明后学 地域阳明学

王阳明一生的政事活动地域，时人誉之为“阳明先生过化之地”或“阳明先生遗爱处”^①，今人称之为“阳明先生行迹地”。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王阳明，其一生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王阳明，其讲学活动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培育了数以千计的弟子并有再传、三传乃至数传（统称“阳明后学”），进而形成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的阳明学派。依黄宗羲《明儒学案》所涉阳明后学籍贯及学脉传承的析分范式，浙中（浙江）、江右（江西）、南中（江苏、上海）、楚中（湖北、湖南）、北方（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粤闽（广东、福建）、黔中（贵州）、桂中（广西），既是阳明后学聚集活动区，也是王阳明的主要行迹地，是为“地域阳明学”命题得以成立的依据。

近年来，在政界、学界、企业界及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王阳明与王阳明行迹地的“地域阳明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一大“显学”^②。而研究“地域阳明学”所依据的文献，除了《王阳明全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阳明学基本文献，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目前学界对阳明学与地方志的研究仅限于赣南、福建等某一地域的个案梳理与研究^③，对王阳明的方志观尤其是阳明后学群体赓续阳明“为天下万世而作”的理念参撰地方志的具体实践与宏观阐释则付之阙如。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缘起，即重点考察阳明学与地方志之间的诸多交涉，进而论述方志也是记录阳明学人活动场域与阳明学后世影响的载体。

一 王阳明的方志观

出生于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王阳明，其本人虽未有编纂志书的具体实践，但是对《尚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阳明学文献整理与思想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0BZX070）阶段性成果。

① 今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阳明洞的洞口上方，镌刻有明朝万历年间贵州宣慰使安国享书“阳明先生遗爱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山上，有阳明门生左江兵备金事欧阳瑜于嘉靖四十年（1561）镌刻的“阳明先生过化之地”。

② 参见张宏敏：《阳明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显学”》，《国学学刊》2020年第1期。

③ 参见赵广军：《方志对文化史料的补充：以王阳明在福建遗留诗文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5期；李晓方：《“阳明过化之地”与“节义文章之乡”：明清瑞金县志对地方形象的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杨锡贵：《大儒王阳明长沙行迹考述》，《长沙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李晓方：《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王剑波：《明清赣南阳明书院与地方社会研究》，赣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以及《越绝书》《后汉书·郡国志》《方輿胜览》等方志性文献的编修体例及志书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功能颇为谙熟。明弘治八年（1495），时任山西高平知县的浙江慈溪人杨子器主持编修《高平县志》；而后遣人恳请时在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乡友王阳明撰序，年仅24岁的王阳明遂有《高平县志序》。序文开篇，王阳明就追溯了方志的起源：“《禹贡》《职方》之述，已不可尚。汉以来《地理郡国志》《方輿胜览》《山海经》之属，或略而多漏，或诞而不经，其间固已不能无憾。”进而称颂《明一统志》纲目及其编修体例之完善：“惟我朝之《一统志》，则其纲简于《禹贡》而无遗，其目详于《职方》而不冗。然其规模宏大阔略，实为天下万世而作，则王者事也。”^①在此，王阳明以为，志书之修纂“实为天下万世而作”；进而指出，各州（府）、县之长官在任上即负有编修志书之责：“若夫州县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职。”同时，为便于官员修撰志书，王阳明又对自《越绝书》以来的通行的志书编纂体例、收录内容予以概述：“今所谓志书之类者，以纪其山川之险夷，封疆之广狭，土田之饶瘠，贡赋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产，井然有方。”^②易言之，地方志就是记载某一行政区域内地理、沿革、风俗、物产、名胜、古迹的史志文书。

正德十年（1515），时任南京鸿胪寺卿的王阳明又应金坛县县尹刘天和之邀，为他主持修纂的《金坛县志》作序。文中，王阳明对一部志书应予呈现的十大主题（天文、地理、食货、官政、典礼、学校、选举、人物、宫室、杂志）予以阐述：“夫经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纪之地理，所以顺其利也；参之食货，所以遂其养也；综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节之典礼，所以成其俗也；达之学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选举，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宫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杂志，所以尽其变也……修此十者以治，达之邦国天下可也，而况于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观政矣。”^③这里，王阳明提出志书“可以观政”的政治功能。简言之，方志不仅具有“考图志以求其山川形势于仿佛间”的感性认知功能，还有“为天下万世而作，则王者事”的资治属性。在王阳明这里，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而这也充分体现王阳明以志观政、经世致用的方志观。

二 阳明后学编修地方志的具体实践

也正是鉴于“为天下万世而作”的志书“可以观政”的功能，王阳明的弟子门人及再传、三传乃至数传，在阳明学“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感召下，或在仕宦地，或在家乡，多热衷于“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的具体修纂。

嘉靖三十八年（1559），致仕家居的阳明门人顾应祥（浙江长兴县人）主持修纂嘉靖《长兴县志》；其亲撰序文，其中有“观天之文，察地之宜，而审乎人事之变，斯可立政矣；政立而教化矣，此志之所为作也”^④云云。与乃师王阳明“可以观政”的修志理念相同，顾应祥亦认为，志书具有“政立而教化”的资治、教化功能。

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五年，阳明弟子、陕西渭南人南大吉任绍兴太守。任上，他不仅刊刻阳明学经典文献《传习录》，还主持编修12卷本的嘉靖《绍兴府志》。罢官家居后，南大吉还应时任渭南知县辛万钧之邀，依照《绍兴府志》的体例，成功编纂出渭南历史上的第一

①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66页。

②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867页。

③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727—728页。

④ 张慎为修，金镜纂：顺治《长兴县志》卷首《长兴县志旧序》，清顺治六年（1649）驯雉堂刻本，第3页。

部县志——嘉靖《渭南县志》。^①

阳明再传弟子、浙江山阴（绍兴）人张元忬也参与了家乡的史志编纂——万历《绍兴府志》（署名“萧良幹修，张元忬、孙矿纂”）、万历《会稽县志》（署名“杨维新修，张元忬、徐渭纂”）和《云门志略》（署名“张元忬撰”）3部志书。^②其父张天复纂《山阴县志》未竟，张元忬则续成之。万历十五年（1587）初刊的《绍兴府志》^③，是绍兴府属自嘉泰《会稽志》以来流传较广的一部志书，以体例精核、考证明晰、图文并茂著称，也是中国方志史上值得称道的佳作之一。张元忬与孙矿（字越峰）合作编纂《绍兴府志》过程中，多有书函往来。在《寄孙越峰论志事三通》中，张元忬对志书的编纂年限、余姚县“人物”的采择标准予以阐述，尤其对“阳明先生传”的编纂取材予以辨析，并提出了“郡志纪一乡之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也”；又言：“凡任事必任怨，志书尤甚。若志出而欲一时人人悦服，此万万不能。要之不愧此心，不乖公论，令千百世后有可征，则已矣”^④。王阳明籍贯所在地余姚县，在明代隶属于绍兴府，而阳明晚年则移居绍兴府城（新建伯府）居住，还在南大吉修建的稽山书院讲学并撰有《稽山书院尊经阁序》，故而由阳明门人南大吉修纂的嘉靖《绍兴府志》，由阳明再传弟子张元忬参纂的万历《绍兴府志》，对于后人研究王阳明在绍兴的游学场景（如会稽山、禹穴、南镇、阳明洞、炉峰、秦望、兰亭、云门、若耶、鉴湖、剡曲等地）则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对于张元忬撰修的《云门志略》，《四库全书总目》载：“《云门志略》五卷，明张元忬撰。元忬有《绍兴府志》，已著录。云门山在会稽城南……（元忬）以《山川》《古迹》《名贤》为一卷，而余四卷皆《艺文》。”^⑤云门山也是王阳明的游学地，嘉靖三年（1524）曾与弟子董澐“徜徉于云门”^⑥，赋诗《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后二十七年矣，将下，适董萝石与二三子来，复坐，久之暮归，同宿云门僧舍》。^⑦张元忬编修的《云门志略》就收录有王阳明《登秦望山用壁间韵》《登峨嵋归经云门》等“艺文”以及无名氏的《次阳明韵》等。

创修于嘉靖三十年（1551）、刊刻于嘉靖四十年的嘉靖《浙江通志》，作为官修省志的创始，实则由3位阳明学者接力完成，最终署名“胡宗宪修、薛应旂纂辑”，并由徐阶、薛应旂撰“序”。南中王门学者、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人徐阶，出任浙江按察僉事兼提督学政之时发起编修《浙江通志》，但因转任江西按察副使，遂委托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继续辑纂。江苏武进人薛应旂，亦系阳明学者^⑧，在浙江提学副使任上，“士论颇协”；离任后，杭州等11府各属儒学生员呈书知府，请薛应旂入祀杭州西湖孤山“七贤祠”。而纂辑刊刻《浙江通志》，则是薛应旂入祀“七贤祠”的一大缘由。嘉靖《浙江通志》之所以署名“胡宗宪修”，是因为“私淑”王阳明并曾任余姚知县的胡宗宪，在嘉靖东南倭乱时期，出任直浙总督、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王阳明系浙江人，故而由3位阳明学者接力编纂的嘉靖《浙江通志》，则是研究阳明学在

① 参见南大吉著，李似珍点校整理：《南大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145页。嘉靖《渭南县志》明刻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手抄本现存上海图书馆。

② 参见张元忬撰，钱明编校：《张元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38页。

③ 参见萧良幹修，张元忬、孙矿纂，李能成校：《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年。

④ 张元忬撰，钱明编校：《张元忬集》，第141—144页。

⑤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22页。

⑥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210页。

⑦ 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651页。

⑧ 薛应旂师从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黄宗羲编《明儒学案》将其归入“南中王门学案”，参见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册，第689页。

两浙地域传播的一部重要文献。

浙江湖州归安人唐枢，罢官居乡期间编纂了嘉靖《归安县志》《乌程县志》《孝丰县志》、万历《湖州府志》。正德十六年（1521），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欲修《南昌府志》，时阳明门人蔡宗兗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书院事，遂使其开局于洞中，还邀请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等江右阳明学人一同参与。^①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于嘉靖五年（1526）任南直隶广德州通判，受时任州守龙大有之邀总纂而成《广德州志》，惜未竟而去职；嘉靖十三年，时任广德州知州胡万里派人至江西安福向家居乡里的邹守益索《广德州志》旧稿；邹守益付以旧稿的同时，撰有《广德州志序》：“嘉靖丙戌（五年），某判广德二年矣。日与诸生从事于复初之教，会茶陵龙子大有视州政，亟以《州志》见委……于是稽群籍、访故老，定为图、为表、为志、为传，凡十有七卷。逾年将就绪，而龙子与予陟南都以去。后政者不相谋，遂以中尼。比予卧疾山中，而胡子万里自关中来视政，亟遣使索旧稿，如龙子之委。乃束稿付诸生，使敬图其终。”^②由此可见，阳明弟子邹守益对《广德州志》编纂体例的设定以及志书所发挥的“立大公而扩顺应，章好以示民之俗，慎恶以御民之淫，使四患以屏，三美以臻，勒成邦国之典”的资治、教化功能，同乃师王阳明一样，都有着清晰的定位与理性的审视。

列入“泰州学派”的阳明学者、广东惠州人杨起元，在丁外艰回乡守孝期间应惠州知府之请，编纂了万历《惠州府志》。江右王门学者、安徽涇州人冯应京丁内艰居家期间，协助时任县令编修了万历《盱眙县志》。列入“泰州学派”的阳明学者、浙江绍兴人陶望龄，应邀为万历年间刊刻的《上虞县志》《西平县志》撰序。^③浙中王门学者钱德洪在嘉靖三十八年则应时任峡江知县何石庵之邀为新纂的嘉靖《峡江县志》撰序。钱德洪以为“山水人物、租赋庸调、政体风化”三者构成了《峡江县志》的主体，“以告新令尹，使之开卷，而一邑之政，掌可示也”“后之治斯邑者，思其政则思其心，思其心则思其学”，这就是编纂方志的初心——“身居一时而心究于千百世”^④；与此同时，阳明学者邹守益、钱德洪也为《峡江县志》撰序。

阳明学者、江西泰和人郭子章，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平乱期间编纂了60卷本的《黔记》。《黔记》作为一部贵州省志，内容涉及明万历年间贵州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地理、工艺、文学等。王阳明任贵州龙场驿丞期间，著有诗文集《居夷集》；而《黔记》中就载有不少王阳明的诗文^⑤，以及席书、施瓚等与王阳明之间的往来书函^⑥，还有对王阳明讲学活动场地（诸如龙场、龙冈书院、阳明洞、阳明书院^⑦）的记载。

嘉靖三十五（1556）至三十八年，浙中王门学者王宗沐先后出任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在讲学、政事之暇，凭一己之力纂修的《江西省大志》在嘉靖三十九年刊刻，为目凡七：《赋书》《均书》《藩书》《溉书》《实书》《险书》《陶书》。王宗沐“自序”，其中有“大志，志大省也。先是，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宗沐被命督江西学政，再按列郡。讲业之暇，颇采其俗产、山川、赋役、大都”^⑧云云。至于王宗沐发凡起例的《江西省大志》的实用价值，《王攸宁

① 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1051页。

② 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

③ 参见陶望龄撰，李会富编校：《陶望龄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3—156页。

④ 钱德洪撰，朱炯点校整理：《钱德洪集》，宁波出版社，2019年，第57—58页。

⑤ 参见郭子章撰，赵平略点校：《黔记》，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330、354页。

⑥ 参见郭子章撰，赵平略点校：《黔记》，第786、873—874页。

⑦ 参见郭子章撰，赵平略点校：《黔记》，第214—215、403—405页。

⑧ 张宏敏：《王宗沐著作考论》，《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年谱》评价说：“事核而评，计通省常赋，指掌可按，迄今成不刊之典。”^①江右系王阳明及阳明后学重要活动地，通读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师从江右阳明学人欧阳德）独纂的嘉靖《江西省大志》，有助于我们理解“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②的深刻意蕴。

江右王门学者、江西泰和人曾才汉，嘉靖十七年（1538）出任台州府太平县（今温岭市）知县。任上，曾才汉以太平县自成化五年（1469）析治至其时70年无“志”为憾。嘉靖十九年二月，遂拜谒赋闲“独居山中”的阳明学人叶良佩，以纂修《太平县志》事嘱托^③；叶良佩欣然受命并赋诗作《曾明府枉驾请修县志》：“极知文献千年事，谁信图书一县难。凡例讨裁稽古制，词章芟琢畏旁观。分枝国史从刘向，秉笔乡儒有谢安。令尹高才应自见，柴门浊酒且交欢。”^④嗣后，叶良佩设馆于太平县西墅精舍，聚诸书于馆中，选学官弟子博达者佐助，“凡四阅月而《志》成”。同年六月，署名“曾才汉修、叶良佩纂”的《太平县志》成书。叶良佩作《太平县志序》，曾才汉撰《书〈太平志〉后》，对县志的纂修经过、谋篇布局、文献价值予以评论。《太平县志》卷4《职官志上·社学》载曾才汉上任伊始创办太平社学事：“选儒士为师，取阳明先生《小学教约》畀之，令民间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皆入焉，教以习礼歌诗。”^⑤阳明学在浙南台州一带的社会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

三 地方志文献助力地域阳明学的研究

通过对王阳明的方志观及其弟子后学参与修纂地方志文献及他们对地方志功能认识的梳理，我们认为：“阳明行迹地”与“地方志文献”抑或“阳明学”与“地方志”两者之间存有高度的关联性。《王阳明全集》（《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后学文献丛书》^⑥等阳明学基本文献之外，明代中后期流传至今的地方志文献也是阳明学尤其是“地域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浙江余姚是王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王阳明的晚年讲学地及归葬地，瑞云楼、龙泉山、中天阁、四明山（白水冲、龙潭、龙溪、四明山心）、兰亭、秦望山、云门寺、禹穴、阳明洞天、鉴湖、南镇、若耶溪、洪溪等场景地与王阳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余姚县志》《绍兴府志》《山阴县志》《云门志略》《四明山志》则为我们了解王阳明与余姚、绍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杭州是王阳明外出离乡、返乡的必经之地，并曾在西湖（净慈寺、圣果寺）归隐，故而《钱塘县志》《仁和县志》《杭州府志》《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南屏净慈寺志》《武陵梵志》乃至《浙江通志》均是研究王阳明与杭州（西湖）的参考重要文献。《嘉兴府志》《海盐县志》中也有王阳明的诗文。衢州因“四省通衢”的地理方位而成为王阳明人生的重要驿站；王玘、栾惠、周积、徐霁等师从阳明并自觉开展良知学的传习，是为衢州阳明弟子群。^⑦王阳明在衢州

① 王氏后裔编：《章安王氏宗谱》卷1下，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本，第7页。

② 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明儒学案》，第7册，第377页。

③ 参见张宏敏：《叶良佩与阳明学人之交游》，《贵阳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④ 叶良佩撰，张宏敏等点校：《叶良佩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⑤ 今宁波天一阁藏有嘉靖《太平县志》，上海古籍书店在1963、1981年据此本连续两次影印出版。又，曾才汉修，叶良佩纂《嘉靖太平县志》作为《太平古志三种》（温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校）之一种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标点出版。

⑥ 目前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编校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已经出版两种，一种是凤凰出版社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2007年），另一种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2013—2019年）。

⑦ 参见周纪焕、周心逸：《王阳明在“南宗圣地”衢州的弟子群及其特征》，《孔学堂》2019年第2期。

一带的讲学以及衢州阳明学群体的基本情况，可以通过《衢州府志》《西安县志》《衢县志》《龙游县志》《江山县志》来一一检录。

王阳明从京师贬谪至贵州龙场，从浙江经江西、湖南入贵州，以及离开贵州再到江西庐陵，这期间创作有不少诗文（《居夷集》），而这些诗文创作的空间场景可以通过《玉山县志》《广信府志》《临江府志》《袁州府志》《分宜县志》《宜春县志》《长沙府志》《常德府志》《辰州府志》等予以印证。王阳明路经长沙府“寓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诸事，在《长沙府岳麓志》《岳麓书院志》中有记载。有论者以为，方志中关于王阳明访岳麓未果及“寓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的记载均失实。^①也有论者指出，方志中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1507）“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②《贵州通志》《黔记》《思州府志》《镇远府志》《贵阳府志》《修文县志》等，佐以王阳明在贵州期间创作的诗文集《居夷集》，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王阳明在贵州（贵阳、龙场）期间的诗歌吟诵、讲学授徒尤其是对“龙场悟道”场景的历史还原。

王阳明在滁州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琅琊山下的讲学场景以及弟子后学在滁州创立阳明书院诸事，在《滁州志》《南京太仆寺志》《南滁会景编》中均有记载，这可以补《王阳明全集》（含《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之不足。而王阳明在南京的讲学活动可以通过《应天府志》《金陵梵刹志》得到一些线索。

王阳明一生两次入闽，遁迹武夷，进军汀州、驻节上杭、平寇漳南。在闽期间，也留下多篇诗文，这在《武夷山志》《汀州府志》《漳州府志》《上杭县志》中均有记载。有学者比较了《王阳明全集》中所涉王阳明在福建的诗文与福建地方志记载上的差异，认为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可以作为文化史料的有益补充。^③福建平和县乃王阳明平乱后向朝廷申请奏设，《平和县志》中丰富的文献史料则为我们详细研究王阳明与平和之间的诸多关联，尤其是平和设县的具体过程提供了第一手文献。^④阳明离世后，福建学人及仕宦至福建的官员先后在武夷山、长汀、上杭、平和等地共立祠十余座以祀阳明，铭记其捍患平乱之功，感念其施民教化之德。^⑤这在《武夷山志》《上杭县志》《平和县志》《汀州府志》《漳州府志》中皆有体现。

阳明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事功成就主要在江西完成。弘治元年（1488），青年王阳明为迎娶夫人诸氏至江西洪都，寓居时间达一年半；返归浙江余姚途中，舟至广信，谒一代大儒娄谅，语以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而始慕圣学。^⑥正德五年（1510）春，王阳明由龙场驿赴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任知县，并有惠政。^⑦正德十一年九月，因汀漳各郡有巨寇，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翌年正月至赣，直至正德十六年八月归省至越，在江西任职时间长达五年半；先后荡平漳南、横水、桶冈、大帽、浰头诸寇，继而“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在此期间，王阳明还广收门徒、兴立社学、讲学不辍，刻《古本大学》有序、刻《朱子晚年定论》亦有序，门人还刊刻了《传

① 参见杨锡贵：《大儒王阳明长沙行迹考述》，《长沙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参见邓洪波、赵路卫：《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参见赵广军：《方志对文化史料的补充：以王阳明在福建遗留诗文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5期。

④ 参见王相修，昌天锦等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康熙《平和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⑤ 参见张山梁：《闽地祠祀阳明考》，《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⑥ 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1002页。

⑦ 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1008页。

习录》。^①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在历经宸濠、忠泰之变，在江西（赣州、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②。《吉安府志》《吉安县志》《庐陵县志》为我们详细了解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的政事活动提供了线索。王阳明在赣州、南安期间的军事戡乱、力举乡约、大兴社学、讲学授徒、刊刻文献等事在《赣州府志》《南安府志》《赣县志》《南康县志》《瑞金县志》《会昌县志》《雩都县志》《南康县志》《上犹县志》《赣石录》《龙南县志》中均有记载。崇义县系王阳明奏设之县，《崇义县志》更是详细记载崇义县治的由来。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是王阳明的“落星之地”，《南安县志》《大庾县志》就是了解王阳明病逝经过的辅助文献。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期间的军事行动尤其为“献俘（宁王）”从江西沿长江水道多次往返于江西与南京之间的诗文创作，可以通过《南昌府志》《南昌县志》《九江府志》《临江县志》《新淦县志》《南康府志》《芜湖县志》《彭泽县志》《安庆府志》《铜陵县志》《池州府志》等加以佐证。《青原志略》对了解王阳明在青原山及其弟子后学在青原山的讲学活动最具参考价值。此外，《江西通志》《江西省大志》中也记载有王阳明及江右阳明学者讲学及政事活动的诸多场景。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从绍兴出发经江西、广东前往广西征抚思恩、田州；平定思田之乱，向朝廷谏言奏设隆安县；而后，再用兵破袭八寨、断藤峡诸贼；班师回朝途中，在广东广州、增城短暂讲学。对于王阳明在两广的军事、讲学活动，我们可从《广西通志》《梧州府志》《苍梧总督军门志》《南宁府志》《浔州府志》《宾州志》《思恩府志》《思恩县志》《田州府志》《上林县志》《柳州府志》《隆安县志》及《广东通志》《广州府志》《肇庆府志》《增城县志》《韶州府志》中检录到不少文献史料。作为王阳明的“事功”与“言教”之地，明嘉靖年间，广东惠州府、潮州府、广州府等地也修建了大量阳明祠。^③这些阳明祠在《惠州府志》《潮州府志》《广州府志》中均有记载。广东和平县乃王阳明奏设，《和平县志》则是了解王阳明与广东关系的一个重要文本。

以上所述，便是地方志中的王阳明与阳明学的文本书写以及阳明学在大江南北各地域的生成、传播、发展过程的史实描述，而地域阳明学的丰富内涵在地方志文献中有着多元的记录与呈现。

结 语

总之，方志是记录阳明学人活动场域与阳明学传至后世并有深远影响的文本载体。明代中后期流传至今的众多地方志文献，为我们深层次、全方位了解以“阳明行迹地”为指向的王阳明与各地域文化之间的诸多关联，尤其是为“地域阳明学”命题的论证与细致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如条件允许，还可以对《阳明先生年谱》及地方志文献中记载的“阳明行迹地”实地踏勘。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为完整地梳理出王阳明与浙江、北京、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阳明行迹地”之间的诸多交涉。简言之，地方志中的“阳明学”是一个有待全方位检录、深层次挖掘的学术研究领域。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第1015—1054页。

② 参见张宏敏：《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与地点》，《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

③ 参见刘和富：《功祀与道祀：明清时期广东阳明祠的地域差异探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